

论中日数字文化的民族特性

林娟娟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摘要] 数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两国数字文化的差异,揭示中日数字的语言文化特质,以及隐含其中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

[关键词] 中日数字差异;民族特性;语言文化

一、数字的产生和运用

数的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计数的需要,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它在推进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数文化。

在现代生活中,数字已成为世界的表征、世界的语言。没有数字,人们无法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无法量化和把握事物的形态。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21世纪,数字的功能被演绎得更加登峰造极:数码相机、数码光波微波炉、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数字化技术已迅速广泛地渗透于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时代,领略到了数字化生活的多姿多彩和极端的便利。

在语言学领域里,数字被称为“数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表示纯粹的数量意义。因此,在科学的数字世界中,它的秩序严谨,职司分明。但是,作为语言组成部分的数字,在人类长期使用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无比广阔的文化视野。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是简单的数值符号或数学概念,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它反映和象征着不同的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相当突出地体现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数”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表述、说明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关系等复杂的哲学命题时,古代哲人的许多认识、思想和理论都离不开数字的参与,数字因此被神秘化,对数字的崇拜亦由于不同的民族而不尽相同。对各种数字的不同运用,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特色,其选择性具有久远的民族文化根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各个民族形成了各自的数字观念。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和日本数字文化的比较研究,了解两国数字文化的信息以及别具一格的魅力,分析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数字使用上的差异,从而揭示隐含其中

的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避免在跨语言与文化的交际中产生文化误导或文化休克。

二、中国的偶数文化

语言是社会历史、社会文化、社会习俗的反映,带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地域属性和时代属性,积淀着民族的智慧,凝集着民族历史文化。数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便伴随着一定的文化意义,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周代,中国人用蓍草占吉凶,根据蓍草的数目及数的奇偶作判断。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识》中如是说:“取一把蓍草,数一下看是甚么数目,看是奇数还是偶数,也许这便可以断定吉凶。古代人看见数目整齐而又有变化,认为是神秘的东西。数目的连续、循环以及奇偶,都引起人们的惊奇。那时候相信数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术里用得着它。——我们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那些巫术的遗迹。”直到现在,中国人依然崇尚偶数,以偶数为吉的数字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人的这种宇宙观和方法论体现在审美心态中,便是崇尚偶数,以偶数为美为吉的欣赏心理。它积淀成重两两相对的美学传统,即在一文化领域和文明活动中无不以成偶成双成对为至美至善至高的境界。

中华文化大量现象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偶数情结。结婚宴席要办8桌或成偶的桌数;设宴待客要做四道菜或偶数(2、4、6、8、10道)菜肴,出单则谓之不恭;结婚贺喜、走亲访友要送偶数的礼品,寄予好事成双的愿望。否则会被怀疑不懂常识,或被认为故意讨人嫌,只有送双才合乎情理。虽然近年来这种习惯不断发生变化,渐渐有人送起了单数的礼品,但是送礼者与受礼者的内心似乎总感到不踏实。这种喜双乐偶的社会风俗与自古以来无论什么都喜欢成双成对、喜欢对称的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崇尚对称、崇尚对偶的

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凡了解中华文化的人都会深刻感受到，我国古代建筑群体从都市、宫殿、寺院到一般民家都具有左右对称的特点。如有东塔必建西塔；一侧有殿堂，另一侧亦必定建有相同的殿堂；那神气十足地矗立在左右两侧的狮子也必是成双成对，给人一种极其四平八稳的感觉，并从中得到安全感。纵览现代建筑形式和布局，也仍然可以发现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求双成对的传统审美心理。

这种从偶数讲究对称美的观念还表现在其他文化形态方面。诗歌创作中，对偶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段。比如：诗词讲对仗；书法、绘画等讲究对称美；古代文化讲究“两点论”等等。我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自古用成双成对的事物来讴歌爱情的真挚与永恒，表达追求美满幸福之愿望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俯拾即是。

“双”、“对”、“两”虽不属数字范畴，但都含有数的意义，体现了中国人崇尚偶数的观念。因此，用成双成对表达吉祥如意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不胜枚举。如“送礼成双”、“好事成双”这类词语，“双”不再是简单的“两”的意思。如“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等词语，在中华民族的观念里，总是把两个不可分割的、抑或自然配对的、按情理应成为一体的人、物或事融为一体，称之为“双”或“对”。它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在我国台湾和闽南地区，自古以来人们遇事爱讲究吉与凶。从破土、盖屋、迁居、嫁娶、开市、出门乃至探病、理发、修置、作灶等诸多琐碎小事，都要慎重其事地问吉卜凶，选择“黄道吉日”，以求得即日乃至永世的吉祥如意、平安幸福，求得心灵的慰藉增强自信心。所谓“黄道吉日”即“双日”。如果能选择月、日均是偶数为吉，星期也都是偶数更佳。若能择上阴历阳历同是双数更是吉上加吉。日本的“大安”，意为大吉大安，与中国的“黄道吉日”相同。通常，我们在日本的挂历上看到日期下边印着“先胜、友引、先负、私灭、大安、赤口”的字样，它就是用来表吉凶的，每六天一循环。这是中国道教阴阳八卦里的六壬时课，日本室町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人加以改造而形成的，江户后期开始广为应用，至今依然盛行不衰。日本人平素一般不拘琐事，但是每逢庆典或重大事情必择吉日，那时，只要翻开日历就能如愿择吉避凶了。“大安”也称“大安日”或“大安吉日”，日本人多选在此日举行结婚典礼。“赤口”是大凶之日，只有正午抑或中午11时至1时之间为吉；“先胜”是上午吉，下午凶；“友引”则是早晚吉，白天凶。因有带朋友的迷信说法，忌在此日举行葬礼。“先负”上午凶，下午吉。用阴阳道之说，

禁忌在此日处理公务或办急事。“私灭”则有万事不吉，诸事不宜之迷信说法。总之，尽管择吉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求吉心理和传统习惯如出一辙。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选择双日的“黄道吉日”行事的传统习惯也逐渐淡薄了，但是遇重大事情的时候，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慎重地择双择偶择吉，以求大吉大利。

三、日本的奇数文化

与中国人喜爱偶数相反，日本人崇尚奇数，自古以来就有以奇数为吉为美的数字观念。他们认为单数为阳，象征吉祥。如：日语“钱别”一词的意思是对即将外出旅行、调动工作或乔迁新居至远方的人临别时馈赠钱财或礼物。通常，日本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并衡量对方同自己的关系亲疏与否决定赠钱多寡。但是，不论赠钱的数目多少都必定是奇数，一般为3千日元、5千日元、7千日元、1万日元、1万3千日元、1万5千日元……。平素送礼，捆礼品的绳子也一定是单数。

日本人喜欢“三”这个数字。在神社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新郎新娘要行“三三见九”的交杯之礼。新郎新娘对饮交杯酒时，各用三只一组大小不同的酒杯饮酒，每杯啜3口，共喝9口。斟酒人往酒杯斟酒时，需反复2次斟酒的动作姿势，第3次才往酒杯里倒酒。在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或集会时，日本人特别喜欢反反复复地振臂“三呼万岁”。日本人何以这么热衷奇数“三”？关键应在于对“三”的理解，其根源则应追溯到先民对“数”的认识。

自从“数”的观念产生以后，在人类思想的发展中已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意义，它同时被作为沟通天人、把握世界的一种哲学观念。因而，在古希腊出现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中国则有了先秦的阴阳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原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摄着宇宙的一切现象，从而导致了神秘主义。中国的数学家认为，物生而有象，象生而有数，万物莫不有数，进而以“数”行占验之“术”，以“术”占验其“数”，推测人与事之吉凶。所以，先秦的“数术”大体就是巫卜之术。

但是，先秦用“数”的观念说明世界的不止“数术”一家，道家、儒家等也致力于用“数”的观念构造宇宙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图式。《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中的“一”“二”“三”都各自有实际的含义。一般认为，“一”指元气，“二”指阴气和阳气，“三”指天地气合而生万物的和气。儒家则以一部《周易》之书，揲蓍以求数，因数以设卦，由卦而观象，依卦而系辞，用“数”演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显示一个生生不已的宇宙图式。

在中国先秦诸多以“数”构造的宇宙图式中，我们

注意到“一”、“三”、“五”三个数字最具重要意义。在这里，暂不谈“一”和“五”，只议“三”。在老庄哲学中，“三”为有限之极，又为无限之始，其为万物生化之关键。《周易》六十四卦的基础是八卦，八卦取奇画为阳，取偶画为阴；三画成列为一基本卦。而三画取义：上一画开天，在天成象；下一画为地，在地成形；中一画为人，人为万物之灵。故八卦的原理乃是合天、地、才“三才”以包举万象，阐明宇宙人生变易的规律，故称“天人之学”。我们在这里看到数字“三”作为卦爻三画之“三”即“三才”之“三”，成为中国“天人合一”哲学这一最高智慧的基数，具有以有限寓无限、包罗万象、总括一切的意义。所以，“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受到特别的重视。

数字“三”这种带有神秘的哲学意义渗入中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官以“三公”为尊，学有“三老”为长，伦常以“三纲”打头，等等。但是，它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落实为礼的度数而实现的。这一点从上古卜筮之法可以看出。《礼记·曲礼上》：“卜筮不过三。”孔颖达疏：“卜筮不过三者，王肃云：‘礼以三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则不举也。’”这里“三（次）”成为卜筮求吉的限度。但是从疏引王肃的话可知，“卜筮不过三”乃是“礼以三为成”的一个体现。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礼以三为成”应是周礼的制度。春秋以后，“礼崩乐坏”，“礼以三为成”的传统自然而然随之削弱，但是秦汉以后，礼教不断被重整以延续，“礼以三为成”的许多规则，在实际生活中仍然保持了下来。例如：“三跪九叩”、“三呼万岁”、“酒过三巡”等等，显而易见“礼以三为成”至今依旧是中国人生活的一种法则和习惯。中国的道教、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和儒家文化于4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构建日本传统文化的基础，在日本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一直为日本民族推崇备至，成为日本人的哲学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日本人对“三”的顶礼膜拜，可以说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结果。

翻开日本的挂历，我们还可以发现日本的13个法定的节日几乎都置于奇数。其中，有一个节日最能说明日本人重奇数。这个节日的时间在11月15日，称为「七五三の祝」。当男孩满3岁或5岁，女孩满3岁或7岁时，必须在这一天举行祝贺仪式。父母给自己的孩子穿上漂亮的和服盛装，然后一起去参拜神社，祝贺孩子过去健康的成长并祈愿今后顺利发展。从节日的名称、时间直至庆贺的对象无一不都是奇数。「七五三」还是日本人用于庆典的数字。他们认为一、三、五、七、九的奇数可喜可贺，择其中三个数字作为正式宴席上菜道数：“第一道七个菜，第二道五个菜，第三道三个菜”。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诗歌“和歌”和“俳句”。“和歌”和“俳句”在日本文学中最具有民族特性，它吸收并融解了中国诗歌骚体的特点，依据日语在表现力上的基本特点，采用音数有规则的变换来构成韵律，从而形成独特的短诗形式。比如“和歌”，它是由“五、七、五、七、七”共31个音数有规则的参差而构成。例如日本和歌集《百人一首》中，遣唐使安倍仲麻吕的一首《望乡歌》云：“天の原 ふりさけ 見れば 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出でし月かも”（辽阔长天浩月升，仰首遥望动乡情。犹是当年春日月，曾在三笠山顶明）。诗人所构思的意境和抒发的望月思乡的感慨之情，都凝集在这31个音数之中。这种诗歌形式洗炼朴实，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文坛诗人们吟诵心声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形式。再如“俳句”，它同样依托日语音数有规则的参差，由“五、七、五”的17个音节构成。如江户时代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悠悠古池畔，青蛙跳破镜中天，叮咚一声喧）。诗人在短短的17个音节里借景抒情，文笔清淡，语言洗炼，意蕴隽永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不管“和歌”还是“俳句”，各行的音数都是奇数，行数也一定是奇数。

据说日本诗歌是日本人模仿中国诗词中的五言绝句或七言律诗创造而成的。但是，我国的五言绝句每行均排列5个文字，行数都是偶数。如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七言律诗则每行均排列7个文字，行数也一定是偶数。比如唐代诗人张继所作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究竟为何形成这种都用奇数排列的诗歌形式呢？恐怕还一时难以弄清楚。然而，我们却由此得知，喜用奇数是日本诗歌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整个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

四、中日数字文化差异的民族心理

当然，日本人不仅仅只重奇数，他们还同中国人一样，十分钟爱“八”。中国有句成语“八字打开”，意思是像“八”那样，一撇一捺，向两边分开。中国人喜欢用来比喻毫不隐藏，开门见山。但是日本人喜爱“八”是因为“八”的字形上窄下宽，使人联想到路越走越宽广，事业越来越发达。打开日本的《新明解国语辞典》，对“八”的解释除了数字以外，还有如下的意义：[和语の“やつ”が“弥”に通じ、かの意に多く用いられる上に、字形が末広がりで縁起が良いとすの向きがある]。日语的“末広がり”即扩大、扩展之意，“末広がり”即逐渐扩展、逐渐兴盛。由此，我们又进一步得知，“八”不仅包含富有余，更有事业发达、吉利祥和之意，难怪日本人对“八”这个数字顶礼膜拜。据考察，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量

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就视“八”为圣数,相信这一数字中孕育着吉祥美好、兴盛圆满。所以,日本人在举行婚礼时,所摆宴席为“八”桌。他们还把“八”与意志坚强联系在一起。日本有句谚语“七転び八起き”,意为“不屈不挠”、“屡次失败都不气馁,站起来继续奋斗”。日本人认为达摩名僧是不倒翁,他在山洞修炼时曾经倒下七次,第八次的时候终于站了起来,修成正果。因此,日本人崇拜和敬仰他,在家里摆上不倒翁,又藉此激励自己不断努力奋斗。

不言而喻,中国人喜爱“八”自然是源于崇尚偶数的传统观念,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八”与“发”谐音。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获得了愈来愈大的经济实惠,物质生活水平直线上升。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为之不断追求不懈奋斗,企望能发大财。于是“八”这个数字愈发身价倍增,被炒得大红大紫。在以偶数为吉的中国人的数字观里,“八”是个圣数,它表示财源滚滚来,象征吉祥幸福。据调查,1988年8月8日在闽、台、港、澳以及海外华人中新开张的公司和企业为历年最多,因为这一天8字最多而被视为发财机会最多。“八”与“发财”既然联系在一起,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商家便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诸如“吉祥电话号码”、拍卖私车牌照号码、把“八”用于商品价标以刺激顾客的购买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有趣的是,日本人关于“八”的圣数观念近似中国的“九”。“八”在日语中除了上述所表示的意思之外,还有“广博、宏大”之意,对此,中国却用“九”来表示。

在中国“九”与“久”谐音,象征永久吉利,自古以来被视为吉祥之数。在中国人眼中“九”极富神秘色彩。中华民族对“九”的迷信可以说是源于对天的崇拜,也与龙的图腾有关。《说文解字》云:“九,阳之变也,象其尾曲穷尽之形。”有人据此考证,“九”的原始意义为九头龙。《易经》把一至十的数字分为奇数和偶数,奇数象征天和阳性事物,偶数象征地和阴性事物。在“天数”中“九”为大,为极,在《易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列为第一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于是,古人以“九”代天,天与龙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以九附会帝王,称其为“九五”之尊,所以,中国历代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力乃天赐神赋,他们竭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为了追求自己“万岁”和王朝的“永久”,他们对“九”更是情有独钟,“九”遂成为皇家的象征数字,与帝王密切联系在一起,凡是与皇帝有关的建筑和器物都离不开“九”字。比如,天安门城楼以“九五”之数为建筑格局,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明永乐时,北京建有九座城门;故宫的房屋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故宫的太和殿高九丈九尺;故宫各门的门钉纵横各九排,共九九八十一

颗;皇帝身着九龙袍;天坛的许多建筑也都与“九”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九”被称为“天数”,又象征事物的极限,故汉语中有许多用“九”这个数字形容广博、宏大、多数之意的词语,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九州方圆”、“九牛一毛”,等等。

“九”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如此至高无上,然而,在日本可就“苦”了。因为在日语中“九”与“苦”的发音完全相同,追求人生幸福的人自然不愿看到“苦”降临于身。于是,带有“九”字的电话号码等被视为不吉利而备受冷落。如:49谐音“四苦”,“*仏教の中で人生の種の苦痛。生、老、病、死の総称*”。又如:4989谐音“四苦八苦”,“*仏教の中で生、老、病、死の四苦に愛別離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盛苦をあわせたまの。人生の苦の総称*”。若是有人被施于这样的数字,必定怒火中烧,大发雷霆。

由于中国和日本都是使用汉字的国家,从语言发音方面讲究吉凶的心理可谓雷同,但是中日两国的语言发音又不尽相同,关于吉凶的说法也就大相径庭了。在日本,日语的“四”与“死”的谐音就十分招人嫌,日本宾馆的客房号和医院的病房号都避开“四”这个数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尽量避免使用“四”的音读,而采用训读。究其根源,原来古代日本人对语言怀有一种极为朴素的敬畏感,即所谓的“言靈”信仰。他们认为语言是有灵魂的,它蕴涵着人类智慧无法限量的不可思议的灵感。他们坚信,一旦话说出口,就会带来所说的现象,发生好事或坏事,因而在言语和行为上有所顾忌,进而产生了忌讳语。这种纯朴的认识渐渐形成习惯延续至今,成为现代日语的一种表达形式的“忌み言葉”。“四”和“九”这两个数正因为犯了日本人的这个大忌,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与此相反,中国人喜欢“四”,把“四”视为非常重要的数字。据考察,“四”在古代就是一个吉祥数字。一方面,因为“四”是偶数,体现了中国人的偶数情结,而数为“四”的时候常常可以令人称心如意。“四海一家”、“四海兄弟”、“四平八稳”、“四通八达”、“四亭八当”等等,就是认为“四”表达了圆满的心情。中国对“四”多列为赞美数词,如:“四大古都”、“四大名山”、“四大书院”等等。中国台湾和闽南地区的人习惯在喜庆的日子或对人施与大礼时用“四”种礼品,称其为“吃四色”或“送四色”;河北和青海等地给女方买衣当彩礼时也买四件或八件,传统习惯因地而异。

不过,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变,人们对数字又有了一番新的理解,赋予它特殊的含义和内涵。由于谐音的因素原本不受青睐的“八”越走越好,而“四”由于谐音“死”,人们也时常对“四”不怀好感而另眼相看。台湾地区 and 闽南地区多数人忌讳“四”,就是因为“四”与“死”在方言中近

音。如：1274 与“要你去死”近音，太不吉利；14 与“实死”近音；24 与“儿死”近音；45 与“死吾”（我）近音；514 可读“吾亦死”；574 可读“吾妻死”；884 是“爸爸死”，等等，都属于忌讳语。厦门地区从 2002 年 10 月 1 日起不再发放带“四”字的车牌，也是为了满足占车辆消费主体的私家车车主的需求。当然，若是车主实在喜爱“四”可以另行申请。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从语音上附会而趋吉避凶的心理是中日数字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结束语

数的天地广阔深远，数的学问奥妙无穷，数字的文化内涵深刻而广博，异彩纷呈。世界通用的数字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其不同的文化伴随意义，同一数字反映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引发不同的联想，为此而产生的数字崇拜和禁忌也迥然不同。中国人崇尚偶数，以偶数为吉的数字观念中蕴涵着传统的中国

文化；而日本人喜爱奇数的习惯里同样蕴含着传统的日本文化。我们只有努力从各个方面深刻了解两国人民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传统的生活习惯、独特的审美意识，以及各自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避免和克服在跨文化交际中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会和冲突。

[参考文献]

- [1] 新村出. 广辞苑 [Z]. 东京: 岩波书店, 1993.
- [2] 金田一京助等. 新明解国语辞典 [Z]. 东京: 三省堂, 1989.
- [3] 金田一春彦. 日本語を反省してみませんか [M]. 东京: 角川书店, 2002.
- [4] 杨启光. 文化哲学导论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5] 王晓澎, 孟子敏. 数字里的中国文化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0.
- [6] 成良斌. 中国数字崇拜与禁忌透视 [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1995.
- [7] 彭丽君. 俄汉数字文化对比与翻译 [J].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2001.

(上接第 237 页)

1. 调整泸县工业结构。改变小而全的工业建设思路，通过关闭“十五小”企业、“五小”企业、以及企业技改升级等手段，积极与县外、省外企业联姻和采取走进高校、走进科研单位的办法，寻求高科技无污染或轻污染骨干项目；制定更加优惠的招商政策，特别针对无污染的高科技项目，创造宽松政策环境，力争引来金凤凰；创建几个大型骨干企业，形成适合泸县县情的优势产业，同时充分利用县城繁荣的契机，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水平。

2. 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将大于 25° 的坡耕地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建造防护林、育丰林、用材林，水系两旁种竹保土，省道、县道、村级公路两旁植常绿阔叶乔木，提高全县林木覆盖率。为了确保所种竹、木在 3—5 年内能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合理安排种与伐的问题，走厂林结合道路，待竹、木资源充足有保障的情况下，走木浆、竹浆生产高档纸的路子，使农民所种竹、木有稳定的销路，增加农民收入，提升纸品档次，培植税源，实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激励措施，鼓励农民，加强退耕还草和用冬闲地种草工作。除保持水土的环境效益和为草食动物提供食料、发展畜牧业，增加增收途径外，必须引导农民着眼城市绿化大量之需，有步骤有计划建观赏草、草坪基地，使农民变被动为主动退耕还草，实现退耕还草的目标。

3. 加强小集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小集镇建设迅速的加快，集镇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化进程加快，集

镇与集镇、集镇与城市大有连成片之势。在建设小集镇过程中，必须加强规划力度，保证必要的绿地比例；在对小集镇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经分散处理后，建小型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1000—5000m³，投资 100—300 万元），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对集镇生产垃圾进行处理，采取分拣高温有机堆肥化或引进现有技术，利用生产垃圾制建材。只要通过上述措施，就能杜绝和避免集镇污染包围城市，堵住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源头。

4. 大力改善能源结构。推广无污染的燃气。首先，大力推广 CNG，使汽车尾气得到彻底根治，减少光化学烟雾的罪魁祸首—NO 的排放和含铅悬浮颗粒向大气中排放。其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城镇居民、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私营民营餐饮旅馆等服务业以天然气或电为能源，禁止燃烧原煤，减少酸的罪魁祸首—SO₂ 的排放。再次，农村应大力提倡使用石油液化气，以及大力推广农村沼气，村庄已经形成规模的，提倡把废弃物转化为燃气进行集中供气，逐步过渡到禁止燃烧秸秆，利用农业废弃物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样可从根本上解决能源消耗带来的温室效应问题，减少烟尘对大气的污染，实现蓝天工程；还可减少农民砍伐林木用作燃料，以求农村生态环境不受破坏。

5. 大力调整农业结构。改变农民传统的耕作观念，有的放矢地走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之路，大力发展苗圃业、种草业、养殖业、名优果业，使农民真正从现代农业得到实惠，从而调整粮经比例，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